

呂振羽全集

第一卷

革命未平不營生王以萬所說真面目而易
行之有道的辦法大不啻乎史家工作極為
了然也其文筆有如文章很能將其深
于廣于了然的方略和才德逐步地由總
引而深入使读者日利提高一般地說本
家主以詩為體以道為用者亦極好於于
其大的雅高和深奥之是不可少一星五
不能浅薄以至可憎也蓋竹林精神實能
却者得之于中是春雨吸水以潤其山也
余且情而更即通通而更身以如身了道
雅且作而德道行之深人所尚之文之篇以
通而秋毫不爽甚其有不勝其視妙其流也

呂振羽全集

第一卷

這行字有益的討論，如《音韻學》、《文哲學》等書，
對於當時的文學有不為寫得很好。但這些
文章可謂是他的專門研究，這不能說他
對中國文化史之著述別無所知，一般地說，大
家對這三篇論文甚為贊美，似都認爲十
分較大的進步和深遠之處。在另一方面，這
不能說是人所僅知者，精神富於想像，
創造力強，上是春秋戰國學者所共知。
今具備而更以通過歷史學術的途径，
藉其傳而更以通過歷史學術的途径，
這兩點不能算得是不能忽視的特點。

封扉题字:魏恒斌

责任编辑:陈鹏鸣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振羽全集/吕振羽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

ISBN 978 - 7 - 01 - 012872 - 6

I. ①吕… II. ①吕… III. ①吕振羽(1900~1980)-全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9518 号

吕振羽全集

LÜ ZHENYU QUANJI

吕振羽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66.75

字数:6162 千字 插页:42

ISBN 978 - 7 - 01 - 012872 - 6 定价:1500.00 元(全 10 册)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吕振羽全集》编委会名单

主任：陈德文

副主任：蔡美彪 张向东 吕 坚

委员（姓氏笔画为序）：

王利锋	吕 坚	朱发建	朱佳木	朱政惠
伍卓群	刘中树	刘茂林	刘桂云	刘海藩
阮芳纪	孙纯良	李元元	辛广伟	杨成岩
张向东	张传玺	张忠培	张锦城	陈瑞云
陈鹏鸣	陈德文	林甘泉	林安西	桂遵义
唐未德	展 涛	陶德麟	黄书元	崔 岩
彭卿云	董宏志	蒋大椿	舒 文	蔡美彪
戴开柱				

秘书：张佳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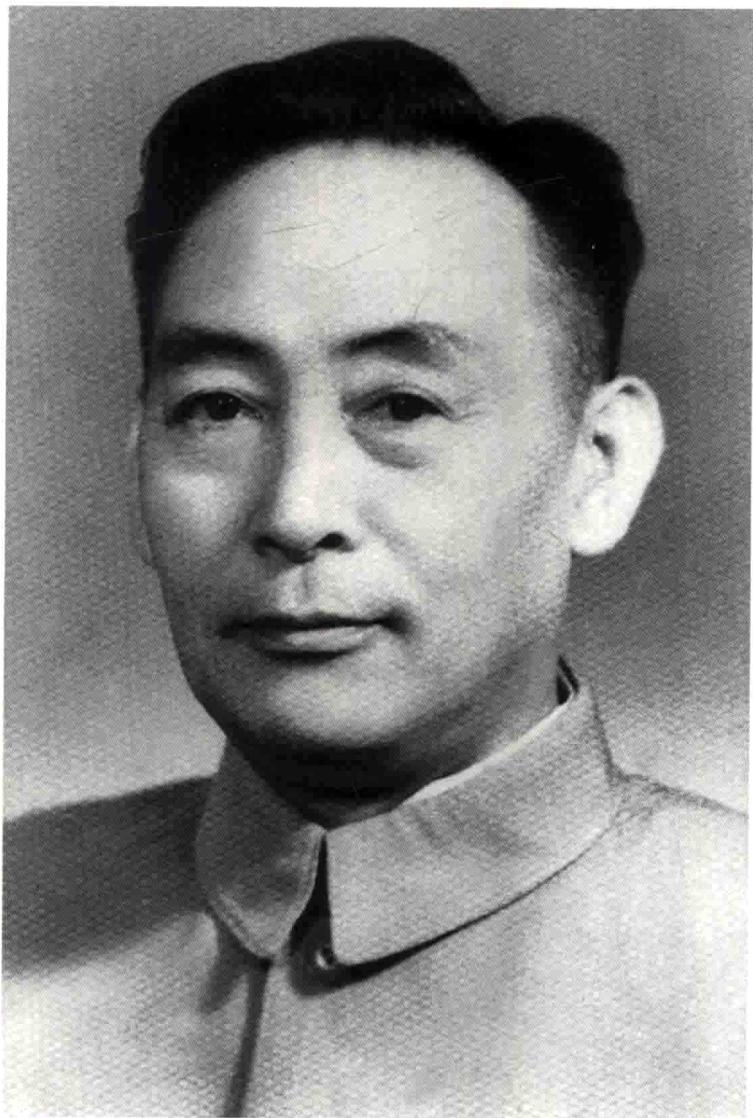
《吕振羽全集》学术与技术支持名单

学术支持：

熊铁基 何清平 王启慧 唐增烈 陈抗生
萧致治 谢保成 郭必强 李孝迁 孙颖

技术支持：

谷林 张佳宁 刘佳 吕晓婧 段俊峰
张广智 伍天宝 李学忠 蒋学平 黎良毛
董毅



吕振羽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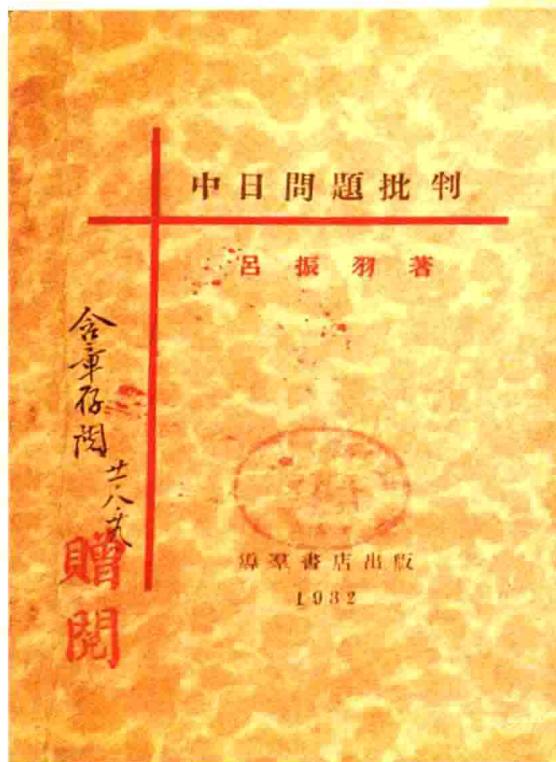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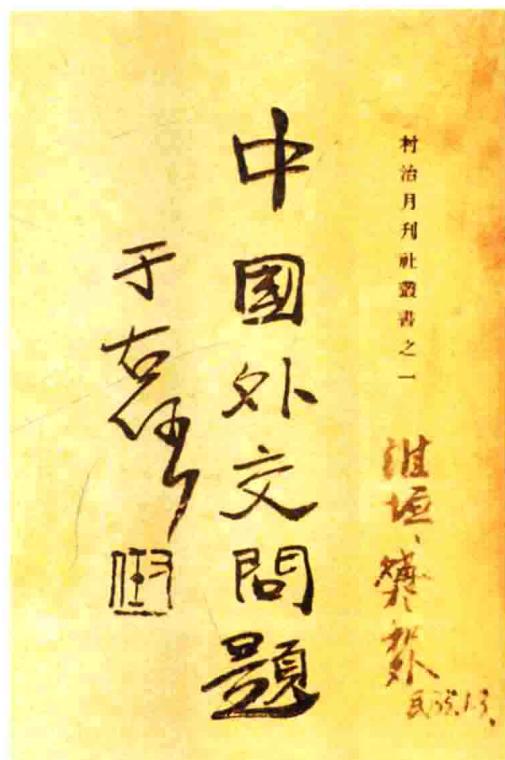
吕振羽经馆学习时诗文手迹

咏榴花得红字
十九岁入静齋書室
齊師門下同讀初學詩
院內石榴花開艳絕江
何時成碩果此日莫搖風
敬師改句云種得榴花樹
初開絕色江何時能三眠
昔日已搖空

1926年4月，吕振羽(左五)湖南大学毕业合影



《中国外交问题》书影



《中日问题批判》书影

《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书影



毛泽东 1942 年致刘少奇及
华中局电报手迹(调吕振羽等去
延安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四月廿四日发)
沙奇同他及董竹君、徐昌黎明夏三月
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布宣调和
一批带款返延安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例在苏北师大院系研究所
子树不如来此成就较大(一)③
董卿同他的于高明徐昌黎强有力的
强有力(如高明徐昌黎)所的争
及山东邵阳的高明徐昌黎,望力争
促重病(高明徐昌黎)。中央代电
23 (四月廿四日发)

前　言

(一)

吕振羽，原名吕典爱，字行仁，学名振羽。1900年1月28日出生于湖南武岗（今属邵阳）金称市溪田湾里村。这时正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毒害遍于国中。这一湘西南边隅之地，不仅西方的洋教堂干涉地方行政，列强商品输入也打破传统生产方式，农业、手工业破产情景比比皆是。农家、小工匠土纺、绩麻、家织等陆续衰落，很多甚至丧生、绝户。

武岗位于湖南省西南部、资水上游，多苗、瑶等少数民族。明清以来，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就绵延不绝，忧国爱民志士接连涌现。著名思想家魏源、杰出护国将领蔡锷，都诞生于这块土地。吕振羽的家世也是当时中国苦难和奋进的缩影，曾祖父吕先纪参加过太平军。吕振羽曾追述云：“吾父个性尤类先祖，力疾豪强，同情愚弱，常为羽兄弟道农村黑暗，至明白而易晓。于羽兄弟之生活意识，殊有至大影响。此殆由其困厄生活中所得之体念欤！”（《吕振羽全集^①·九卷·吕氏留念亭碑序》）

吕振羽天资聪慧，自幼在家做过放牛、割草等农活。9岁在父亲蒙馆就读，后转入邻村的玉公山坊读书。1917年夏，入武岗县立中学读书。临毕业

^① 以下简称《全集》。

时，吕振羽在维新思想老师、国学家萧承舆“策问”（副题为“曷各言尔志”）中写道：“如国家民族危亡，当拜谢祖宗，舍身以赴，告黄帝轩辕于地下；如国家昌盛，只求茅屋两、三间，卧读唐诗，以至南窗……”。萧承舆对其抱负给予“生有此志，吾甚嘉欣，但作来颇不易……生欲行其志，务求踏实，凡事从一已始。”的评语，使他终生难忘。

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席卷武岗时，吕振羽和青年们一道走上大街，示威演讲，焚毁日货，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被推为武岗学生联合会会长。1921年，在家乡吕氏祠堂资助下，吕振羽怀揣“工业救国”思想，考入长沙的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工科）机电系。入大学后，对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学习和研讨，自此开阔眼界，寻求报国之路。在驱除学阀、校长宾步程的学潮中，被推为湖大“驱宾大会”副主席，同时结识了当时的省学联会长夏明翰，接受其建议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旁听了李达先生“新社会学”课程，从此与李达结下师生之谊。1926年7月大学毕业后，他到老关报名投考北伐军，录取后担任政工人员，辗转湘赣等地。1927年9月，在同乡前辈资助下，由上海东渡日本入明治学院学习经济。1928年因经费支绌，返回上海。后在同乡前辈介绍下赴北平，先协助《国风日报》复刊并任编辑。又经人介绍参加了《村治月刊》筹办，任主编。

“村治运动”是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一度出现的社会思潮，希望通过农村的自治，完善乡村建设。吕振羽出于信奉和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愿望，一度十分关注，曾去山西、河北考察，在《村治月刊》发表过数篇研究文章。但后来发现这种所谓的下层政治建设根本解决不了农民生活的基本问题，“问题便等于虚悬”。在《村治月刊》工作期间，他撰写了《中国外交问题》（《全集·一卷》）一书，书中表达了坚决反帝和铲除军阀官僚、地方豪棍的政治思想。但阎锡山（《村治月刊》出资方）曾对刊发此文表示不满，认为外交问题与村治无关。

1930年起，吕振羽离开《村治月刊》开始创办和编辑北平《新东方》杂志，此份杂志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直接掌握的刊物，但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参与。主要成员郑侃、刘思慕、谭丕模、杨刚等，都是一批热血青年，他们还共同筹备建立了“东方问题研究会”，试图探索东方弱小民族解放的道路，谋求民族独立自强。《新东方》的语言也很炽烈，呼吁东方民族振奋精神：

“勇往直前共同奋斗，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应该觉悟，忍受目前的一切痛苦来创造一个新东方。”（《新东方》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新东方》的民族独立情怀和反帝反殖观点遭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满，刊物因“宣传共产嫌疑”被查扣。

同年11月16日，吕振羽撰写了论文《中国国民经济趋势之推测》（《全集·八卷·史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点，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及其趋向展开研究。他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从资本、土地所有权、工银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六个方面考察资本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社会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前三个要素看，即从产业资本的集积、原料的生产储积、劳动市场的供给和劳动技术三方面看，是有发展可能的。但从国家主权和政治、商品贸易、市场三要素看，情况不尽然。因为，“中国国家主权陷于不完整的状态”，这种不完整的政权又“依附于封建的统治之下去求生存”；至于市场，无论国外抑或国内，都处境维艰，“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无望，是客观事实所决定了的。”他强调中国资本主义之不能发展，主要是先进资本主义替它加上了羁绊。这个矛盾，只能归到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的有机的体系上去解释。他还提出在社会主义完全建成以前，中国必须经历一个“民主造产”和“民主集产”的过渡时期。中国现在离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还是很远”，“不能忽略经济的条件”，批评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不经过渡时期“便想直接跑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言论。

同年下半年至1932年的一段时间，是吕振羽一生中学术研究十分繁忙的时期。他先后撰写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中日问题批判》（《全集·一卷》）等学术著作，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主义市场再分割理论对当时的中国经济、中日战争、世界经济危机等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明确指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必将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论断。这些论著也为他日后走上马克思主义治史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期间，他还曾积极参与筹组热河抗日义勇军，赴张家口向青年作抗日演讲。

(二)

1933年以后，经李达推荐，吕振羽到中国大学经济系执教，开始任讲师，不久升为教授。主要讲授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学、计划经济学、殖民地问题、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其中的社会科学概论课包括《唯物论和辩证法》、《社会发展史》两门课程。他还兼任民国大学、朝阳大学教授。他的学术演讲深深吸引了一批爱国青年。他与李达、黄松龄、张友渔等一道，被称为中国大学的“红色教授”。该校的不少学生如董毓华、黄诚、段君毅、杨易辰、任仲夷、史立德等后来都成为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骨干。

这时的吕振羽，在思想上已是一位较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1933年6月撰成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全集·二卷》），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早期著作，后来《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系在此基础上修补完成。讲义共八编，依次为：一、导言；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三、殷代的奴隶制度经济；四、西周：初期封建制度；五、初期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封建领主的没落过程：春秋战国；六、“变种”的封建时代（一）：大地主经济优势时代；七、“变种”的封建制度（二）；八、“变种”的封建制度（三）：小地主经济时代。“导言”称：

如果人类社会发展法则的一般性不得到确立，便可使我们对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甚而各种史的研究不能前进一步。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则，是一元的：均有其一般性的……。

那班抱历史发展法则之多元的观念论者们，只要他们肯转向事实方面去思维一下，或许也有对问题明白的一天。

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焦点问题所提出的理论见解。李达对他的这一学术研究转向起了关键作用。李达指出，应该从社会史的角度阐明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而要研究好中国社会史，必须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要注意史料的正确性问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出于认识现实中国的需要，学者们将自己对现实社

会考察的目光转到对于历史的考察，试图从历史演变趋势的分析上，论证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和走向。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问题涉及到中国所有阶级的切身利益，于是导致了一场影响史学界的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观点是明确的，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大体上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最终要走向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还是反帝反封建。当时郭沫若根据他所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对中国社会史作出自己的阐述。他在1929年辑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写道，“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入了封建时代”；“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郭沫若的研究及其观点影响了当时一些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中国历史的探讨。吕振羽是紧随其后的一位重要的探索者。

吕振羽撰写的第一部史学专著是《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全集·三卷》），1934年6月出版。他认为马扎尔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观点有谬误，错误的实质是“拿上层建筑的东西去解释下层基础”；他明确提出奴隶制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若没有这一特定阶段的存在，则后来的‘文明时代’便不可思议”。他还认为所谓商业资本这东西，“并不能独自的代表何种生产力”，就是在商业资本最发展的封建社会末期，“也并不能对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有何重大的改变”。同时他也对托派、新生命派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吕振羽的这些观点得到李达的充分肯定，并为该书作序。李达认为作者采取谨严的态度，“一方面指出波格达诺夫主义的‘商业资本社会论’的错误”，“一方面指出马扎尔派‘亚细亚生产方法论’的错误”，“又从世界史的观点，指出非奴隶制度社会论的错误，坚决地确认奴隶制度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

当时，有关中国史前社会的考古发掘成果相当少，疑古思潮的崛起，又使对史前社会的研究举步维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首创性在于，吕振羽从仰韶文化中石锄、谷粒等发现的事实，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已经懂得种植，而根据摩尔根、恩格斯的阐述，东半球的种植业出现要比西半球晚得多。他认为古史辨派学者反对封建古史观的壮举值得肯定，但否定一些古史、古书，乃

至将古籍所载神话传说中有真实历史背影的成分也一并否认的做法并不可取。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源，虽不敢完全确定，但“能代表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真际意义，是我们敢于确定的”，“古籍神话中保留着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不仅能正确的暗示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意义，并且还相当丰富”。吕振羽主张以考古文物与古籍所载神话传说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突破史前社会研究所面临的史料不足的困难。他认为凡已发掘出来的确实的考古资料，务必引用，作为对某个历史阶段或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论证，并注意神话传说和考古材料两种内容间联系的分析。由此，他对中国史前社会历程的大体意见是：传说中之“尧舜禹”的时代，为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时代；传说中之“启”的时代，为中国史由女系本位转入男系本位的时代。吕振羽对中国原始社会史的阐述，是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史前社会研究作出的创新性认识。翦伯赞评论吕振羽在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 1939 年版）

接着，他又撰写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全集·三卷》），1936 年 11 月出版。在该书中，他确认殷商已经是一个很实在的奴隶制社会。根据甲骨金文、出土文物、易卦爻辞、古籍文献等，认为当时的社会已明显形成若干阶级和阶层，如天子、帝、王、公、侯等为贵族，武人、邑人、行人为自由民和平民，刑人、臣、小臣、奴等为被支配阶级的奴隶。而且史料表明，当时殷代社会已有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明显的分工，所谓纣为象箸、牙床、琼楼、酒池、肉林的说法虽有夸张，但说明阶级分化严重，已有国家机器。首领拥有对人们生命、财产、自由的任意处理权。他认为殷代的奴隶制是具有东方“亚细亚”特色的奴隶制，即土地的国有、农村公社带有氏族组织性质，王权、族权、神权的统一等。当时，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明确提出，中国文明社会的开端大体要到殷商以后，因为殷商是金石并用时代。吕振羽则认为，殷商是青铜时代。他说殷商冶炼业发达，从 12.7 公斤纯铜的炼锅“将军盔”以及重 21.8 公斤的炼渣的发现，说明殷商已达到青铜时代水平。他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环境和国度，以青铜器为标志的生产力是可以步入文明社会的。

该书的又一新的学术见解是认为西周是中国初期封建制的开始。他说西周的分封土地，实际上是在创造等级不同的封建领主和庄园，构成整个封建社会的等级结构及其基础；所谓“受民受疆土”，意思是土地的授予是和人连在一

起的。《诗经》所谓“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就是关于土地连同人民归锡的说法。他认为周代的“庶人”、“庶民”、“小人”等，实际上都是农奴，是周代农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井田制”透露了西周封建领主制社会的剥削方式，与《诗经》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内容结合起来看，“无论在土地的分配上，生产的组织上，便完全符合于初期封建时代的庄园制的内容”。吕振羽认为当时的农民，“除去一小部分的劳动时间在自己的份有地即所谓‘私田’上的劳动之外，则以一部分的劳动时间支付在领主的土地即所谓‘公田’上去劳动”。他认为西周农奴所承担的杂赋相当多，这种既不同于奴隶劳动，又不同于封建地主制剥削方式的情况，十足体现了封建领主制的产品分配形式。该书序言还驳斥了陈伯达在《太白》周刊上对自己的无端攻击。吕振羽创立的商代奴隶社会论、西周封建社会论学说，对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影响，“其理论贡献是不可抹煞的”（林甘泉：《吕振羽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吕振羽研究文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

稍后吕振羽还有另一部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全集·四卷》）问世。初为1935年在中国大学时授课讲义，1936年8月脱稿于南京，1937年6月于上海出版。与前两部史学著作一样，也是出于特殊的思想政治背景。邓拓说当时谈唯物辩证法的人太多了，任何人不管是否真正懂得唯物辩证法的应用，总喜欢充一下时髦，“好像这样一来，立刻就成了时代的理论家似的。”（《形式逻辑还是辩证法？》，1933年）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将中国的历史划为三段：商为神权时代、西周至春秋为贵族统治时代、战国至清为王权时代，一再辩称自己是研究辩证法的。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正是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为论争批判的主要对象。他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划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段是关于奴隶社会时期的政治思想，一段是关于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思想。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又划出领主制封建制的政治思想史时期和地主制封建制的政治思想史时期。他认为第一重要的，“须要把某一时代的经济结构从而其政治形态放在念头”，“正确的明了其时代的生产方法……人类的思想便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顺应着发展着。”他还提出应该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阐述历代思想的流变，认为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进程中，不仅代表官方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变，统治阶级内部各流派的思想也在变，还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意识形态的矛盾

和斗争等等。这一进程是由低级到高级、旧质到新质的进程。《中国政治思想史》被学术界认为是首部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的专著。

在中国大学授课时，吕振羽还担任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北平市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1935年至1936年，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统一部署，他受中共北方局和刘少奇委派，驻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国共合作的谈判。这是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重要活动。吕振羽和周小舟一道，为国共合作谈判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这次谈判的重要联系人与参与者，并于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谁也没想到，三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谈判的参与者或相关人如吕振羽、王世英、谌小岑、翦伯赞等竟深受迫害，或身陷囹圄，或被害身亡。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扣上“出卖红军、出卖红色政权”罪名（三项罪名之一）而被永远开除出党。

(三)

“七·七”事变后，吕振羽奉党指示南下，在长沙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此后不久，担任中共驻湘代表的徐特立也来到长沙。吕振羽、翦伯赞和徐特立一道，筹办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并开展活动。吕振羽担任文抗会常务理事兼研究部长，负责该会全面工作。是时，党内还指定吕振羽、翦伯赞、谭丕模等负责出版《中苏》半月刊。吕振羽围绕抗战主题，撰写了大量时事政论（《全集·九卷》）。这些文章注意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局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从国内民众动员、统一战线发展、军事形势变动展望抗战前景，表达对日寇践踏中华大地的无限愤慨和赤诚爱国之心。1938年6月，经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他与翦伯赞联名致信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提出保卫大湖南的主张。同月，他又向省委建议在家乡邵阳筹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区、乡级地方工作干部和连、排级军事指挥员，为地方抗日游击战作准备。他的建议得到徐老赞同并报中共中央，湖南省委同意吕振羽前往邵阳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聘请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为院长，吕振羽任副院长兼中共地下党代表。吕振羽尽全力于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建设，亲自讲授中国近代